

甘肃省民俗学重点学科建设基地
西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

庙会： 传承新态

人类学·民俗学：来自生活一线的田野报告（第九辑）

主编：郝苏民 马忠才

魏阳竹 等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甘肃省民俗学重点学科建设基地
西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

庙会： 传承新态

线的田野报告（第九辑）

主编：郝苏民 马忠才

魏阳竹 等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庙会：传承新态/魏阳竹等著.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 11

ISBN 978 - 7 - 5660 - 0551 - 9

I. ①庙… II. ①魏… III. ①庙会—风俗习惯—研究—中国 IV. ①K892.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71057 号

庙会：传承新态

作 者 魏阳竹等

责任编辑 红 梅

封面设计 智一视觉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11. 12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60 - 0551 - 9

定 价 36. 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我们的学科之路，这样走来

（代总序）

30年前的1984年，原西北民族学院（今西北民族大学）创办了西北民族研究所，动机原本出自对“十年动乱”反思后的一个学科基本建设之举。所名还是其时国家民委领导人拟定的。这个反思的主旨，是出自这样一种回顾与思考：新中国人民政权，一反千年封建王朝与国民党政府大民族主义的统治惯制，要实现各民族当家做主、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于是开展少数民族工作，培养少数民族各类型干部成为一切首要。为此，应运而生了民族高校的创办。共和国第一所民族高校，便是西北民族学院。她的办学是强调族群性的，也突出了区域性。因此，“西北民族研究所”的关键词应是“西北”、“民族”、“研究”。毋庸置疑，民族高校的学科建设和办学特点，对全国其他普通高校而言，亦应如此看待。

应该说，民族学院类型高校群的产生，确系中国教育史中最崭新而灿烂的一页。然而，西北民族学院从成立伊始的1950年，直至1984年前，却未曾有过科学意义上成体系的民族学的理论研究、专业建制与教学队伍与体系的组建（这与稍后1951年在首都北京创办的中央民族学院的情形：有中国学界老一辈中外著名专家吴文藻等以及早已成为领军人物的费孝通、林耀华等学术大师群体的存在有别）。虽然学科建设上的这种“空缺”，责任与损失并不都来自学院本身与其时奉命而办学者个

人，它与当时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学科等的境遇完全是一致的。随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思想路线的贯彻执行，的确对有志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等的学人们应是一个极大鼓舞。所以说，1984年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所的创办以及《学报》创办问世，从高等教育着眼看问题，便是当时本院民族学人与高教工作者学术心愿的首次圆梦！

然而，发展道路又总是曲折的。“市场经济”转型，带来所谓“全民下海”冲击，本在“意料中”的事实，而“单位”创收，导致高校捷足先登者从办班中捞取的第一桶金，诱惑本在坚守岗位的教师之力，却是令人“意料之外”！希冀重建人类学/民族学的敢想者中也出现了教学与科研比重的意见分歧，科研经费和基础建设等问题无从提上日程的迷茫，凡此直接涉及成员工作量、职称等切身利益的公平与困惑。自然，复杂的表层不能掩盖其简单的内因：历史转折关头老校如何“新生”，学校未来整体发展如何构架？对普通高校而言，民族类高校的不可替代性特点究竟何在？民族院校的时代性角色该怎样定位，哪些是实践实证了的真正“拳头”专业？应恢复、重建哪些机构？又该急速补缺扩建哪些必需的学科？哪些专业由一般普通高校去办比民族高校会更有条件……实话实说，这些本为办学内行领导所关心、研究的事情，因“文革”后遗症受到了影响。

经过彷徨、内外沟通，几经“阵痛”，终于在1998年10月，借教育界连续改革热潮启动和校方领导的理解与支持，原西北民族研究所的我们个别人，决定以放弃原基础资料设备和经过好几个年头整合的学术队伍，以及已在全国圈子里开始产生影响的“西北民族研究所”的“品牌”名称、建制和大部分成员为“妥协”代价，重组三五个青年学术同道加个别老先生，走出原西北民研所的大门，重新组合了“社会人类学·民俗学”

系、所合一的机构，另起炉灶，重开人类学/民族学（民族志学）、民俗学的学科建设。

这个人类学、民俗学名称的出现，为“共和国首座民族高校”办学近半个世纪后首次整合，填补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专业从未有过的科研与学科空白；也在西北民院首出“系所合一”的教学形式，把科研直接引入课堂教学。在大西北人文社科学界第一次出现了人类学、民俗学的学科建制。不久，在费孝通教授力荐下，又借教育部为北京大学批办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契机，与北京大学合作在西北重镇兰州举办第六届高研班。

费孝通先生煞费苦心的目的有二：一为扶持西北民大社会学人类学专业的开创；二为开发西北研究培养专业人才。费老亲临我校为我系揭牌，并在会间主题讲演；召开来自大西北各地青年的各类型座谈会，谈到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培养少数民族出身的专业人才的重要和迫切意义。他语重心长、深入浅出，这给有志学科建设者们以极大精神支持和学术“扶贫”。

5 1990年我们曾首获民间文艺学（含民俗学）硕士学位授予权（马学良、宋蜀华、钟敬文等老一辈学者唯图学术的胸怀和勇气，成了真正“助人成功”的关键），1991年我们开始招收民俗学研究生。鉴于我们对中国西北地区各民族民间文化（民俗文化）的历史脉络和多元现状及其特征的本土理解，在组织教学与科研上，确定了重视田野作业，开辟民俗志积累，坚持多民族地域多元文化特色，从头打好学术基础建设的发展思路。再加上人类学/民族学教学点的逐步开拓与社会学教学，我们打通了三门学科的交叉，以往全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传统教学仅设在中文系（汉语系）多作为讲座课（选修课），以每位研究生入学，必经“始业课”的专业启蒙，作为来自不同专业本

科生开始研究生教学的“补课”；同时，强调导师要根据研究生个人旨趣和优长（或民族、或地域）为本，定其专业研究的具体方向，而不可仅仅依据导师“课题”之需确定研究生的发展方向。随着实践的延续果然局面顿开。至2012年，这个教学点（含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民间文艺学两个研究方向）共招生了10多个民族的硕士研究生147名，已毕业获得学位者132人。在毕业生中近三分之二成为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的考博人员，他们分散于包括香港中文大学、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中山、复旦、南开、南京大学、中央民大、华东师大、东南大学等多所名牌大学攻读、“进站”；至今，其中有的已成长为名校硕士生、博士生导师。从2004年开始，又开始了招收攻读少数民族民间文（艺）学博士生，至2012年已有12人获博士学位。这一集中现象是西北民大创办以来其他院系、专业所未曾有过的。更重要的是，在培养人、训练队伍的同时，积累了不少以专业要求采集到的比较有质量的田野民俗志的新资料。尤其在其后以降，费孝通教授提出西部大开发中人文资源的保护利用与开发的问题后，我们在承担“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内民俗部分的任务中，坚持了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发挥地方性知识和民族语言无障碍的优势，深入生活第一线，零距离现场考察的专业训练学风。民俗学研究生教学实践，在历练了教学骨干的同时，区域民俗志资料成果累累结枝，积累了几百万字的民俗志数据库资料。

我们这个系（所）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艰苦奋斗，借助全国形势好转带来的时运，进一步发展为“社会人类学·民俗学学院”。我们把民俗学的整体学科建设、发展路子，摆脱开往昔传统上仅从“文学”上先入为主地唯以“民间文学”以带动民俗学的旧教学轨道，借鉴相近学科人类学（民族志）、社会学、民间文艺学优势，既互相交叉渗透、互促发展，又各自保

持相对学科独立发展的轨迹。我们用超强的劳作先后开办出游牧、农耕、人口较少民族等民俗及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类型；民族、宗教、文化、家庭、妇女、影视、民间艺术（美术、工艺、歌谣、戏曲、舞蹈）等专业方向，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学生学养的丰厚、“一国多民族”的整体性大视野提供空间，以适应转型期人才市场的多样需求。目前，我们除已有的民俗学研究生点外，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工作和民间文艺学等的硕、博士研究生都在培养之中。

6° 五年来，我们有北大、北师大、中央民大等高校相关先进专业和其中名师们的协助和具体帮助，在大开局面中崎岖前进。我们的民俗田野，涉及西北各民族地区外，也借主题的需求而波及内蒙古、西藏、新疆、四川、华中及至华东，甚至东北各地以及海外。在物质条件极不足的状态下，坚持依靠业内同行办好我们的专业学刊《西北民族研究》，获得学界广泛认同，成为CSSCI刊物；也成为这三个学科硕博生和专业教师们喜爱的一块绿色学术平台。目前，《西北民族研究》已成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我们正努力把促进、服务于教学、科研和社会的学刊，办成“文化走出去的”学术品牌。

我们的学科基础建设和教学实践使我们体会到：虽也无法回避目前还存在于体制上的掣肘和终于常规仍存距离的艰辛事实，但各高校圈内同行认可的这个路子，亦可视为一种有益的中国地方学术实践经验。事实上，在我们之后，也在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界大师级老一代代表人物费孝通、马学良、钟敬文等谢世之后，我们看到从北京师范大学到内蒙古师范大学，也都先后改制或创办了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民俗学等模式的教学建构……我们自己是欣然的。

7 高校在一阵扩招、扩办、并校、升级之后，据说出于

“冷思考”的调整把高校分类为“研究型”、“教学型”几种发展类型，又似乎学校一旦被划进某种类型后，即将在某类型框子内以行政“规范”去管理（如何有竞争）。各校内各学科、专业之间大约已有的发展水平不尽相同，是将随所属学校类型“一刀切”而去存在、发展？还是以所属行业学科实际水平去“强强联合”（如同当年之“院系调整”）去整合？还是随其各校自主“挖墙”、“流动”、“自生自灭”，以示“市场经济”在教育上的反映？抑或已有资源自主存留等市场经济范式……在如今高校领导层似皆为教育内行，大都系博士、教授的现状下，自主趋势如何发展大学，仅为普通身份的专业教授在学科建设、发展中能发挥多大作用？目前难以预测。虽说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研究对象关乎群体、社会、国家认同与人类的大范围，但似乎此类学术属性在中国，往往不像办体育、办艺术那样红火而幸运；确是一种不大显露政绩的“孤独性”学问、学科，得到在意“政绩”、“指标”的领导眷顾，常常是不易的。

好在我们曾经的努力基于事实，亦曾经被其时业内所认同过；“助人成功”之说，本为各自所指各有个人的理解、界定和认可。无论如何师生风餐露宿的“田野”是为学执著的“书呆子们”汗水的播种。于是，仅仅出于其时一个教师的我们，本着曾经为师之心、师生同窗切磋，或曰“教学相长”之情，将把部分学子为攻读学位而参与的调查报告，做初步学术规范和可读性的整理后，以一种资源回报给社会群体，也为这世变方激的新世纪之际，师生们从前沿生活大潮中舀出的这一瓢瓢底层的浪花，存留给来者而感到努力过的欣慰！我们自认为这一行动对当前学术浮躁尚不能一个早晨就烟消云散的今天，于师、于生、于己、于众、更于学校之心，当年大师之良苦用心，皆心同此理吧！

♂ 若有幸，甚而尚存继续从业之机，我们随时准备用被边

缘化了的文化行为寻求可认同的学术合作伙伴。

我们的“人类学·民俗学：来自生活一线的田野报告”系列的编辑，虽也曾得到本学界不少贤达鼓励、促成，但终因未能直接挤入本土的“工程”类和“扶持”类，不足的经费导致了它无法“满书尽披黄金甲”的华贵包装及名人作序牵銜，只能是“素面朝天”，以真人真事的朴实面孔迎接她的识者——广大学子读者了。

本系列之一，曾应方李莉女士建议配合中国艺术研究院“基础数据库”重大项目中民俗部分采集，归入另一丛书出版；本系列之第二、第三、第四共三辑经本校现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文化（苏依拉）教授之力得到本校资助在兰州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之后，系列之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共四辑由郝苏民得到祁庆富教授支持纳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丛书出版。到此，这一系列共八本书，是分别由三处支持才问世的。但是从西北民族大学初创社会人类学·民俗学专业到培养出自己的硕、博研究生和他们的成果，我们实在是得到了不少贤达和学界志士仁人在关键时刻的真诚爱护、支持和帮助才有些许作为的。在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又逢“国学”重新被大大提倡，教育新时代青年一辈也要知恩图报，不可满城尽当“白眼狼”之际，我作为这个系列各辑成果出版的操办和见证人，深深体味了出版学术书籍的不易，不能不郑重提出下列先生和同学，因他们的关爱、辛劳，作为其时导师今日主编的我以及各辑的撰稿人在此一一向他们致以中华民族传统式的抱拳和鞠躬：真诚地谢谢你们了！除已经鸣谢之外，他们应是：费孝通、马学良、宋蜀华、祁庆富、马麒麟、谢玉杰、马戎、杨圣敏、王铭铭、金雅声、何烨、文化、沙平、马国柱等诸位先生、女士！

本系列之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共四辑出版后，据出版社

回应，意料之外地收到良好的市场效应。那么，又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既然社会上还有人自愿阅读，任何凭空之话已无意义；就顺乎读者与学科的“民意”继续办下来了！于是，我们终于以省民俗学建设基地之资格和所获基金和“西北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支持，继续我们系列的延续，这是本系列第三批成果的出版，是继第九辑之后的延伸。

我们还可欣慰地告诉民族民间文化爱好者的是，我们的坚持不仅仅在硕士水平的田野成果的数量上；博士生的田野成果，也将与此同时以“西北民族大学民族民间文化博士论文系列”同步由民族出版社问世。我们相信这应该是一个质量上的努力。

本系列六辑（九至十四）出版受到西北民族大学学科建设基金支持，特致谢忱！

是为序。

A. 速莱蛮·郝苏民

2005年12月岁末于金城沙痕书屋

2007年元月修订

2013年7月9日病后再修订于葵巳酷暑中

目 录

甘肃省甘谷县善华寺庙会与俗民生活研究	魏阳竹 (1)
天水地区伏羲信仰及其祭祀仪式研究	曹瑞琴 (68)
内蒙古“查玛”的表现形式与文化内涵	
——以呼和浩特大召寺为个案	赵 丹 (138)
甘肃省临洮县衙下集拉扎节跳神	
活动调查研究	马根权 (206)
烟台鱼灯节祭海习俗	姜文华 (263)

甘肃省甘谷县善华寺 庙会与俗民生活研究

魏阳竹

一、绪 论

(一) 选题背景

庙会文化的研究一直都受到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宗教学等多个学科的关注。民俗学一直以来致力于研究草根社会和人民大众的生活，而庙会作为基层民众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失的部分，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和重视。将庙会作为一种科学来研究，在五四运动以后就开始了，其主要代表作有顾颉刚的《妙峰山》等。在最近十几年里，庙会研究逐步走向成熟，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近几年来，学者们对国内各地庙会的研究成了民俗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并随着研究的广泛与深入，逐渐形成了多个学科交叉的局面，对庙会文化研究的充实和发展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其实，庙会研究之所以会成为热点，一方面在于庙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载体，富含着包括制度、信仰、经济、地缘、社会结构等诸多文化内涵，与民众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另一方面庙会始终活跃在基层民众的现实生活里，承担着满足百姓精神文化需求与物品贸易交

流的职能，具有很强的当代性。^①

但不可否认，当前我国对庙会的研究仍有许多不足，比如，从研究状态来看，在中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存在一定的不平衡，学者们对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庙会都有显著的研究成果，但对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边远小山村的庙会涉及甚少；从研究方法来看，庙会在研究过程中强调田野调查，而田野调查本身历时长，所需的人力、物力和经费的投资大，另外，对于边远地区，他们的生活条件差，交通不方便，这些因素都给田野调查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善华寺地处甘肃省甘谷县白家湾乡蒋家湾村，位置偏远，交通不便，但其庙会却吸引着来自全县各乡镇的民众前来，成为甘谷县最为知名的庙会之一。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地民众的集体记忆和文化，体现了当地的民俗文化，反映了当地民众的生活情况和基本需要，如社交、信仰、娱乐、贸易等，可以说是当地民众生活的一面镜子。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1. 研究目的

善华寺庙会是当地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其地处偏远的小山村，生活条件艰苦，但当地民众却能通过善华寺庙会获得多种精神上的快乐和物质上的满足。同时，善华寺交通极为不便，甚至还没有公路可以到达蒋家湾村，但善华寺庙会作为民间自行组织的活动，每年都能吸引众多来自四面八方的善男信女，并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当地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善

^① 周大鸣、阙岳：《民俗，人类学的视野——以甘肃省临潭县端午龙神赛会为研究个案》，载《民俗研究》2007年第2期。

华寺庙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西部边远地区的庙会代表。为此,笔者对善华寺庙会进行了田野调查,企图通过对善华寺及其庙会基本情况的了解,结合马林诺夫斯基文化功能主义理论,对善华寺庙会与当地民众生活的关系进行探索,了解善华寺庙会的功能,并就其与俗民的衍生关系予以探讨。

2. 研究意义

(1) 学术意义

如上所述,我国目前庙会研究处于不平衡状态,学者对中部地区的庙会研究成果显著,但对西部地区尤其是边远小山村的庙会涉及甚少。就甘谷县庙会而言,笔者翻阅了各种书籍、资料、甘谷的地方志等,虽然其中对大小庙会记载达一百多个,但记载内容少而简单。从目前来看,学术界对甘谷县庙会研究涉及尚少,更不用提甘谷县边远山村的善华寺庙会。基于此,笔者将本文范围锁定于自己的家乡甘谷县,选择以蒋家湾村善华寺庙会作为研究对象,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搜集善华寺庙会的民俗信仰、传说故事、仪式活动等,并试图运用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功能主义理论,来分析当地俗民生活和善华寺庙会的密切关系,并探索善华寺庙会对俗民衍生的重要意义,为西部边远山村庙会和西部俗民生活的研究提供文献资料。笔者身为甘谷人,对甘谷的传统文化耳濡目染,且掌握了家乡民俗文化学等相关的学科知识,因此,笔者在研究时既能够“跳出”家乡思维,站在学术角度上看问题,能将习以为常的文化现象对象化,比其他身处这种民俗当中的普通人视野更广、更高,又能够把自己置身其间,以本地的思维去理解本地的文化。笔者期望以学术的眼光和视角“回到”自己的“母体文化”中,使自己的学术触觉变得更加敏锐,对善华寺庙会文化的研究作出更为全面、深刻的思考,并希望为西部地区的乡村庙会研究提供一个鲜活的个案。

（2）现实意义

善华寺地处偏远的甘谷县白家湾乡蒋家湾村，当地居民生活条件差，部分地方至今仍未通公路。但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善华寺庙会却每年如期举行，四方来人络绎不绝。多年来，善华寺庙会成为周边村落、全县范围内的重要庙会，成为当地俗民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本文通过田野调查，对善华寺庙会特有的传说故事、观音信仰、敬拜仪式等文化予以介绍，并在此基础上对善华寺庙会与当地俗民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了解善华寺庙会对当地俗民衍生的重要意义。

（三）文献综述

国内对庙会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庙会作为一种学科研究对象，是在五四运动及民俗学运动以后开始的，其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发端期、中断和复苏期、发展期以及成熟期四个明显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庙会研究的发端期。1925年4月30日至5月2日，在《歌谣周刊》的倡导下，学者们对北京妙峰山进行田野调查。当时参加的学者有顾颉刚、常惠、孙伏园、容肇祖、容庚等人。之后《京都副刊》出了六个《妙峰山进香专号》，这些最后集为顾颉刚《妙峰山》^①，其中心思想是“知道民众的生活状况”，并指出：“朝山进香，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决不是可用迷信二字一笔抹杀的。”他们对妙峰山的考察被认为是中国庙会调查研究的先河。《妙峰山》一书中所收录的文章涵盖了香会组织研究，碧霞元君信仰考察，妙峰山进香者的心理，妙峰山的传说等篇目，从中不难看出顾颉刚把庙会看作是民众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力求进行整体全面的研究。在顾颉刚之后，也

^① 顾颉刚：《妙峰山》，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有学者对一些庙会活动进行了调查，如《北平庙会调查报告：侧重其经济方面》、《陈州太昊陵庙会概况》等。此后，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及学者研究兴趣的转变，庙会研究走向沉寂。

第二阶段是庙会研究的中断和复苏期。从抗日战争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环境常动荡不安，许多庙宇被破坏，使对庙会的研究相对停滞、中断。“文化大革命”之后，国内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关注庙会文化研究，有关庙会的文章零零散散开始出现，如《柏柏尔人的新娘庙会》、《古代越南农村庙会》、《中国庙会市场》、《沂山东镇庙和东镇庙会》等，但其以描述为主，研究性的文章比较少。直到1991年5月，首次全国庙会文化研讨会在陕西省宝鸡市召开，使得庙会研究得到了复苏和迅速发展。这次研讨会中，最为典型的是高占祥的《民风民俗的缩影——论庙会文化》，明确提出了庙会文化的两重性，认为庙会文化是以寺庙为依托，在寺庙内及寺庙附近开展祭祀和贸易活动，是宗教和世俗的有机结合，即庙会文化既是宗教的，又是世俗的。其他的文章也对庙会和庙会文化的概念、特征、构成要素、分类、功能、社会影响、起源、运行轨迹和发展趋势以及传统庙会活动复苏和新型庙会兴起的历史背景等作了概括和分析。但由于庙会文化本身的复杂性，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①

第三阶段是庙会研究的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后期，庙会的研究处于发展阶段，人们对不同地区的庙会开始作大量的研究。例如，1994年《山东民俗》第一期专门刊登了山东各个地方庙会活动。1995年张双林编著《中国庙会大观》标志着中国对庙会文化的研究、整理，进入了新阶段。全书介绍了150个庙会，并指出庙会不是宗教文化，而是民俗文化，庙会的发展与集

^① 高占祥：《论庙会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